

分类号 B9
UDC _____

密级 公开
编号 _____

雲南大學

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題目 重慶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業研究

學院（所、中心） 民族研究院

專業名稱 宗教學

研究生姓名 周曉光 學號 1200901126

導師姓名 馬居里 職稱 副教授

二零一二年五月

扉页: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研究生签名: 周晓光 日期: 2012年5月25日

论文使用和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云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和论文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循此规定)

研究生签名: 周晓光 导师签名: 张 日期: 2012年5月25日

本人及导师同意将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进行电子和网络出版，并编入 CNKI 系列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意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出版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研究生签名: 周晓光 导师签名: 张 日期: 2012年5月25日

摘 要

清光绪三年（1877年）5月，英国内地会麦卡泰牧师经万县来到重庆建立第一个基督教会，嗣后各外国差会相继来渝建立教会，基督宗教在重庆市开始传播、发展。基督宗教与近代重庆联系紧密，它触及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基督宗教是近代重庆宗教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重点考察基督宗教在重庆传播和发展中所举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并对之加以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教会办慈善福利事业形式多样，对促进重庆教育事业、医疗发展及缓解民众疾苦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第一部分描述了近代基督宗教在重庆所开展的慈善福利事业，包括医疗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印刷出版事业、育婴慈幼事业及养老服务事业等。

第二部分对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背景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对重庆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 近代 重庆 基督宗教 慈善福利事业

Abstract

About emperor Guangxu three years, Michael card Thai pastor of Mainland Britai set up the first Christ church in Chongqing. Then many foreign churches went to Chongqing to found the churches. Christianity began to spread in Chongq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Chongqing contact closely, including social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Therefore Christianity i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charity welfare in Chongqing.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ext describes the Christian charity welfare in Chongqing, including medical charity, education career,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infant-raising business and pension service kindness young career, etc. The church did charity welfare in diverse form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alleviates sufferings people aspects.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Chongqing Christian charity welfare background and features, and expounds the Chongqing Christian charity welfare social influence in Chongqing. It embodies the Christian charity welfare social function.

[Keywords] recent period, Chongqing, Christianity, Charity welfare

目 录

一、绪论	1
(一) 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
(二) 研究综述	2
(三) 相关理论与实证准备	5
二、基督宗教在近代重庆的传播	7
三、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	9
(一) 医疗卫生事业	9
(二) 文化出版事业	13
(三) 教育事业	15
(四) 育婴慈幼事业	20
(五) 养老福利事业	22
四、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发展分析	23
(一) 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在近代重庆发展的动因分析	23
(二) 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与传统慈善福利事业的特点比较	26
(三) 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社会功能	29
五、结语	36
六、参考文献	39
致谢	42

一、绪 论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基督宗教^①兴办慈善福利事业^②的动机与目的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议题，看法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一般来说，兴办慈善福利事业是基督教会传统的传教布道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在兴办和发展慈善福利事业上，基督教会教育、世俗运动和慈善福利事业上扮演积极、活跃的角色；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越兴旺发达，宗教色彩似乎越趋淡化，世俗化社会服务趋向越明显。长期以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基督宗教与文化事业的研究，较少涉及基督教会与慈善福利事业，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清光绪三年（1877年）基督宗教新教传入重庆，英国内地会麦卡泰牧师经万县到重庆建立了重庆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差会），嗣后各外国差会相继来重庆建立教会，基督宗教在重庆市开始传播、发展。自此，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基督宗教在重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督宗教作为一种进步的宗教，传入重庆以来，与时俱进，敏锐地聆听时代的声音，洞察社会的需求，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发挥其社会功能，参与到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服务于社会和人群，在医疗、教育、赈灾、济贫、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很多社会服务。尤其是战时，基督宗教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更大的体现。

本文的研究是围绕重庆市近代基督教会所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展开。基督宗教自传入重庆地区后，触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在重庆近代的一些较为关键的时期，基督教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所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因此基督宗教教业研究是重庆宗教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重点考察近代基督宗教在重庆的发展，探析它所开展的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社会功能及对现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借鉴。

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自基督宗教进入重庆以来，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范围与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如何在重庆进行社会

^①基督宗教在历史进程中分化为许多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派别。在中国，基督宗教一般指新教，本文中的基督宗教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②广义的慈善泛指基督宗教所进行的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素质、改善生活状况，特别是给服务对象带来好处的宗教活动和努力。”包括教会的救贫济困、慈幼养孤、救助灾民、赠医施药、捐资办学、出版印刷、庇护服务、陋俗改良、乡村服务等等，几乎包括了教会在华除了政治、经济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狭义的慈善福利事业特指那些为穷人、孤老残幼和遭灾民众提供者的传统服务与帮助。

服务？基督教会重庆所办慈善福利事业有哪些？如何生存与发展？如何客观分析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限制？重庆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对现代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有何借鉴？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发展的角度，概略性地勾勒重庆近代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变迁脉络与基本框架，对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背景及特点进行分析，并阐述近代重庆基督教慈善福利事业对重庆社会的影响，从而分析近代重庆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挥的主要社会功能。

（二）研究综述

目前，针对中国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并不多，而且论述不够客观，多是认为宗教是西方侵华或政治渗透的工具。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很少有人关注，相关的研究较少。

就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基督教会在育婴慈幼方面的慈善福利事业研究

黄永昌的《政治风潮：长江教案与湖北育婴运动》以及陈显、黄永昌的《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与湖北育婴》，涉及到了基督教会的育婴事业，谈及了育婴事业是清代最为流行的善举，但研究者多将其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2. 基督教会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慈善福利事业研究

宋玲的《近代中国教会特殊学校述评》和陈天正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论述了不同时期基督宗教对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前者重点论述近代教会在华特殊学校事业的兴起与教育制度特点，及其对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作用。后者着眼点在基督教教育（包括宗教社教化、宣教事业及学校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包括政治、教育、文化、科技、学术乃至出版等方面的变迁）的关系，并论述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变迁对基督宗教教育的影响。

3. 基督教会在医疗方面的慈善福利事业研究

王佑军在《对清后期在华基督教医疗事业的几点思考——兼论其与中国本土医疗事业的比较》一文中，阐述了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医疗慈善福利事业发展情况。李传斌在《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

一文中，考察了 1835—1937 年间教会医疗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变迁及其社会影响，进而揭示了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另外在他与王国平合写的《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中论述了基督教在近代苏州传播过程中，教会医疗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向常水、刘四平在《论近代在湘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中，考察了近代基督教在湘的传播，教会创行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其重要内容。谢铭在《论近代广西基督教的医疗事业》中阐述了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医疗事业对广西社会的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

4. 基督教会战地的慈善福利事业研究

向长水的《教会对战地的慈善救济——以民国时期的湖南地区为例》、党洁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以及邓云、刘婷婷在《试论抗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救助》中，阐述了在抗战时期不同地区的基督教会通过治疗伤病兵、救济难民、难童生活等方式，缓解了战争给社会正常运转带来的压力。

5.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综合性研究

周秋光、曾桂林的《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刘继同的《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概览》、王平的《三十年来大陆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述评》、石莹的《近代中国教会慈善事业研究》，分别阐述了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描述中国各地区的基督教教育、医疗、育婴、赈灾、出版等慈善事业，对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对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如何进入社会、服务社会进行了分析。向长水的《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发展及文教慈善事业》一文中重点考察了基督教在湖南的发展脉向，探析它所开展的社会工作。崔军锋的《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慈善事业研究（1912—1949）》一文，对民国时期基督教在福州慈善事业从其面临的社会生态环境、基督教在福州传教简史、教会各项慈善事工、组织机构、资金来源、教会慈善事业与布道事业、教会慈善事业与福州乡土社会、教会慈善事业与民国福州社会救济事业的现代性转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和考辨。何兰娟在《清末民国年间（1900—1949）广州的基督教慈善事业》一文中，通过对清末民国基督教在广州开办的慈善事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清末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广州的传教活动，进而揭示西方传教士在清末民国年间在广州开办慈善事业的真实目的，以及由此给广州地区带来的影响。刘秀君在

《清后期至民国前期九江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研究》中考察了清后期九江地区传统公益慈善事业的衰落，扼要分析其衰落原因；考察九江开埠以后教会在九江的慈善公益事业状况、类型、特征及其对社会影响。郝红暖在《清代民国河北地区慈善组织的历史演变与空间运作（1644-1937）》一文中以1644—1937年河北地区的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尝试开展区域历史慈善地理研究，揭示了该区域慈善组织经过三次类型多样化和空间扩展过程，并对慈善组织空间运作模式进行了重点分析。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专著并不多。最早的中国教会史研究作品是1981年顾长生所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此书概括性地描述了全国范围内教会医疗慈善福利事业、慈幼福利事业和救灾救济福利事业的发展情况，不过多是持批判的态度。此书在教会史研究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类似的相关综合论著还有顾卫民编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吴义雄编著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等。周秋光、曾桂林在《中国慈善简史》中，以一个章节论述了教会在华的医疗慈善福利事业、慈幼事业、救灾救济事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该书对教会在华的慈善福利事业的论述和评价较为客观、公正。

综上所述，关于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现在来说都是极为分散的，虽然并不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如内容上有基督宗教进行的医疗救助、慈幼事业、战地服务等专题性研究；地域上有不同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湖南、福建、广东等地。但很多其他区域的研究却是空白，如中西部一些地区。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在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政府时期明定重庆为陪都，战时成为军事政治经济的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的中心。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其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等。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宗教也起到了程度不同的作用。遗憾的是，在人们注重对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时，却忽略了对重庆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忽视了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在重庆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特殊时期，社会问题凸显，如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我们需要慈善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调节，以维持社会的稳定。重庆作为推动中国均衡发展的“战略支点”，其发展和稳定

对整个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对重庆近代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可以勾勒出重庆近代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全貌，并且，通过总结重庆近代基督教会所办慈善福利事业的成败得失，对今天举办各项灾害赈济和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三）相关理论与实证准备

1. 相关理论

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的举措，不同的时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内容、形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变化是由不同时期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发挥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笔者选择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分析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

帕森斯把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战略概括为两点：（1）识别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要进行功能分析，即揭示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包含何种功能。二是应具备何种功能才能保证系统的协调运转。（2）分析满足这些功能要求的特殊社会结构。即哪些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社会结构应该怎样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和发挥社会系统的基本功能。^①

基督宗教自传入重庆后，大批传教士来渝，深入各地，备尝艰辛，除了传教外，为重庆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救贫济困、慈幼养孤、救助灾民、施医赠药、捐资办学、出版印刷、庇护服务等领域是重庆市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主要内容。基督宗教在重庆发展的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功能的体现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基督宗教所创办的各种慈善福利机构，如育婴育幼院、慈幼院、儿童教养院、诊所等就是为了使教会服务满足这些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为了保证其自身的维持、存在，需满足4种基本功能条件：第一，适应。即保证环境可以为系统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并可以在系统内部进行分配。第二，目标达成。制定相适应的各种目标，确定各种目标的重要顺序，并调动成员积极性及寻找相应的资源保证目标的实现。第三，整合。系统是由各部分组成的，要发挥系统的功能就必须使各部分协调发展，能够成为一个整

^①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P164).

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第四，潜在模式维系。一种系统功能正常发挥后，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维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制度化。^①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机构要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也要满足这四种功能条件，即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要适应一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能够调动资源实现一定的目标，把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集中指向某些特定的目标；能够协调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使他们为达到某种程度的团结而开展有效的合作；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并维持秩序和活动方式的连续性功能。之所以有些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可以跟随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长时间的存在（虽然大多改变了存在方式，不再依附于基督教会，而是独立或由政府收管），而有些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而消亡，就是因为缺少基督宗教慈善福利机构要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的功能。

2. 研究方法

本文所引用和分析的资料主要通过访谈法和文献法获取，2011年2月，在确定了研究主题后，笔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重庆的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研究。

（1）访谈法。访谈重庆市三自爱国委员会、重庆市基督宗教两会的主要工作人员，获取重庆市基督宗教所办慈善福利事业的基本情况；访谈重庆市部分具代表性及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会中的资深牧师及其他工作人员，了解各教会的历史发展及所办慈善福利机构的情况。如，位于渝中区五四路92号（原蹇家桥），原市公安局旧址内的“真原堂”、重庆南岸区马鞍山福音堂（1910年建）、重庆沙坪坝福音堂（1939年建于重庆磁器口）基督教会，江北城福音堂（建于1895年，2009年迁至江北城CBD的中央公园内）等。

（2）文献法。探访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获取与重庆市基督宗教发展和重庆市福利事业发展的资料；探访重庆市档案馆、四川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

^①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P167).

二、基督宗教在近代重庆的传播

国际上通称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新教在中国已习惯上被称为基督教，它包括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宗派：路德宗、加而文宗、安立甘宗，以及随后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更多宗派，在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中国。据记载，基督宗教新教于 1877 年传入重庆：最初是由英国传教士沿长江逆水而上，在沿途城乡传教，建立教堂，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历经传播、发展时期（1877—1950 年）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时期（1950—1985 年）。

清光绪三年（1877 年）5 月，英国内地会麦卡泰牧师经万县到重庆建立第一个基督教会（差会），嗣后各外国差会相继来渝建立教会，基督宗教在重庆市开始传播、发展，如国差会公谊会，1884 年开教于汉口，后在重庆、成都射洪、铜梁等地传道。^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 70 多年中，由国外传入重庆的教派 19 个，教堂 91 座；由中国人在重庆创建的教会 10 个，教堂 10 座。综合性传教团体及宗教社团，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共计 36 个，教堂 101 座。外籍传教士 174 人，他们分别来自英、美、德、加、澳、瑞典等国。当时的重庆，教派林立，是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历史写照。基督教会办了神学院校、中小学、幼儿园、育婴学校、医院和诊所、护士学校、书报发行机构、福幼村、教会墓地等各种附属机构共 58 个，此外还开办了企业、文化和社会服务事业。

抗战时期，重庆基督徒与全市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如募捐、抗日爱国文艺演出及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等。1938 年，基督教会联合社会各界组织了“重庆红十字救护委员会”，成立了 4 个医疗队，有医生、护士 80 多人，开赴前线进行救护工作。重庆卫理公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合办农村教育服务车，在成渝沿线巡回服务，宣传抗日，服务群众上百万人，社会影响较大。

这期间有 2 所中国人创办的神学院迁入重庆，一所是贾玉铭牧师 1936 年在南京创办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于 1941 年迁入重庆，院址在黄桷垭文峰段 40 号，称重庆灵修学院；另一所是陈崇桂牧师 1944 年在四川宜宾创办的神学院，1946 年迁入重庆，在市中区放牛巷 50 号，称重庆神学院。另外，外国人创办的

^①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39—140 页。

重庆信义神学院和基督教循理会圣书学院，在重庆亦有短暂存留的历史。此外，还有华西三育研究社，后来更名三育神学院。

鸦片战争以后，在华传教士中一些人依仗不平等条约，强买强占土地，修建教堂，并裹胁其追随者横行乡里，干预地方司法权，欺压百姓，加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有相悖之处，由此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酿成的案件，称之为教案。这是基督宗教的时代悲剧。重庆市中区、江北、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等地都发生过教案。由于当时基督教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国内教会在外国差会的控制之下，经费也是依靠差会提供，中国信徒在教会中没有自主权，加之教案多次发生，这就促使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信徒，要求脱离差会，这已成为当时教会内强烈的呼声，开始出现重庆基督宗教早期的自立运动。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耀宗先生等40位教会领袖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革新宣言及相关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重庆基督教徒积极响应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由中国教牧人员自办，与外国差会脱离了关系。1952年12月正式成立了重庆市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三自爱国会），带领全市基督徒，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独立自主自办教会。1958年全市各教派实行联合礼拜，共建8个堂点，结束了解放前教派林立的局面，基督宗教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截至1985年底，全市基督教信徒有约10万人，开放堂点6处，聚会点60多个，按立牧师15位，传道人11位，长老1位。

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重庆基督宗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1979年重庆市基督教爱国会恢复工作，同年12月24日，市中区社交会堂率先恢复宗教活动，举行圣诞夜崇拜，以后各地宗教活动场所逐渐开放，宗教活动得以正常开展。部分教会兴办了招待所、幼儿园、诊所及其他社会服务项目。市基督教爱国会正带领全市信徒高举爱国爱教旗帜，推进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重庆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三、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

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出版印刷、教育事业、育婴慈幼等。这些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既是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途径，也是重庆近代慈善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了深远影响。

（一）医疗卫生事业

西洋医学进入重庆大概是在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法国人在重庆建立天主堂，传教的同时对附近民众进行医疗救助。咸丰十年（1860年），天主教堂设立医馆，为各类病人患者施医助诊，这是重庆最早的西医事业。后来，因为市民不满西方传教士在渝的特权，不断出现破坏教堂的行为，很多传教士逃出重庆，西医也受到排斥，西方医学的传播受到阻碍。

从1891年开始，重庆正式开埠。西方教会陆续来到重庆兴建教堂和医院。当时在重庆由教会创建的医院主要有美国美以美会创立的私立宽仁医院、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建的私立仁济医院和法国天主教所创建的私立仁爱堂医院。在这几所医院中，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最大的当属私立宽仁医院和私立仁济医院。

1. 私立宽仁医院

1891年马加里^①和一位英国传教士共同筹备创建了私立宽仁医院。1892年10月2日，私立宽仁医院正式建成，当时医院名称为重庆综合医院，这是重庆市第一所西医院。1902年增建宽仁女医院，专治一般妇产科疾病及儿童疾病。1903年7月，增设男科医院，主治男性疾病。1938，男女医院合并。1945年医院又扩大了规模，床位由建成初期的30张增加到133张。1948年，成立了砂眼防治所。医院建成初期，只有门诊部、住院部和病房^②。随后，分设门诊，并逐渐增加了专业医疗设备。

私立宽仁医院成立时主要医治的是生活常见病和多发病。当时只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工具，但也进行了多次大中型手术。到19世纪末，私立宽仁医院引进新法接生技术，减少了产妇的痛苦并提高了婴儿的成活率。20世纪初，医院开设了五官科。而后，医院无论在医疗技术上，还是在医疗器具上都有了改进。逐渐添设了显微镜、X光机等。20世纪中期，医院开展了腰麻、局麻、全麻下的脊髓

^① 原名为詹姆斯·H·麦卡特尼，由美国美以美会国外布道团中华基督教派遣来渝传教。

^② 病房分为普通病房和私人（高级）病房，共有床铺30张。

压迫症、浅表部位脑瘤摘除、脑颅损伤和胆囊等手术。^①

私立宽仁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的传播和治病救人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对重庆医院护理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医院刚建立时,并没有专门的护理人员,主要是由修女或少量外籍护士做护理工作。很多时候,医院的医生和病人家属成为兼任的护理人员,因此,医院急需培养专门的医疗护理人员。于是,在1924年,该院成立了私立宽仁高级护士职业学校^②,这也是重庆最早的培养医院护理人员的学校。该校主要开设的课程不仅涉及医疗护理知识还涉及各类综合知识。如不仅有微生物和寄生虫、护理原理、护理技术、护士伦理、营养学、以及内、外、妇、儿、五官等这些医疗护理专业学科课程,同时还设有国文、化学、生理、物理、英语、心理学等各类科学知识课程。该校不仅为当时的医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人员,也为重庆医院护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树立了榜样。护士学校的开办,逐步取代了教会修女充当护士的传统,使医疗护理工作成为一门独立的专科业务。^③

除进行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工作以外,私立宽仁医院还积极倡导成立重庆红十字会。^④并在战时成立救护组织,为受伤的士兵及受战争迫害的民众进行医疗救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私立宽仁医院于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办,在当时的重庆属于医疗设备比较齐全的医院,已经有病床170张左右,可以说是重庆当时市最好的西医院。

2. 私立仁济医院

1896年传教士樊立德^⑤在重庆木牌坊建立了私立仁济医院,医院建立初期设有手术室、各科门诊部、礼拜堂、病房等。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也可进行大中小型手术。后来因经济和用人方面的问题,医院被转交给了加拿大英美会承办。发展过程中,医院不断扩大规模^⑥,增加新的医疗设备,提升医疗水平。逐渐增加了五官科、结核科、胸内科及儿科等。该院还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儿童福利保健科,主要开展儿童饮食指导,给营养不良儿童赠送药物治疗等。^⑦重

^① 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中华医史杂志2006,1月,第36卷,第1期。

^② 该校建于1924年,由重庆私立仁济医院出资创办。

^③ 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中华医史杂志2006,1月,第36卷,第1期。

^④ 重庆红十字会的倡导者为私立宽仁医院第一任院长马加里,在任时间为1892—1916年。

^⑤ 由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并任私立仁济医院第一任院长。

^⑥ 1924年沈德才院长买下南岸皇经庙叶家山152.28亩的基地,修建住院部。

^⑦ 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中华医史杂志2006,1月,第36卷,第1期。

庆私立仁济医院还十分重视医生医疗技术的提升，曾多次派遣医院医生到国外进修，学习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回渝后带动当地医学的发展进步。如 1948 年医院选送李宋医师到加拿大学习内科，而后又入皇家爱德华医院学习胸内科，并于 1949 年通过了美国芝加哥胸科专科学院医师考试，成为正式成员。回国后在仁济医院负责结核科工作，积极推行化学治疗、人工气胸疗法等。^①该院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医院规模，到 1940 年医院病床由建院初期的 40 张增加到 185 张，到 1947 年，又增至 250 张。

私立仁济医院非常重视医疗人员的培训，统一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在医疗及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医院还经常请专家开展讲座，讨论学术问题，加强交流，从而提高医院医生及护理人员的专业服务水平。

私立仁济医院的护理工作也为重庆其他医院做了表率。该院十分重视医疗护理工作，为适应护理工作的需要和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私立仁济医院需要培养专业的、受过正式教育的医护人员。于是，该院在 1925 年成立了仁济高级职业护士学校^②，专门培养医院护理人员。该校每年招生人数较多，不仅为该院培养出了合格的护理人员，也为当时重庆其他医院输送了大批专门的护理人才。

私立仁济医院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当时该院被任命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为在重庆大轰炸中受伤的士兵和民众治病。另外，该院还在抗战期间免费医治一定数量的贫困及生病儿童。私立仁济医院培养出的护理人员在抗战期间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组织救护队，抢救医治伤者。

3. 仁爱堂医院

1890 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定重庆为通商口岸，次年重庆正式开埠，成为中国西部最开放和最重要的城市，紧接着英、法、美、日、德相继在重庆开设领事馆。1900 年，山城步道上半段划给各国设领事馆，下半段划给法国天主教会。1902 年法国人苏福隆^③在重庆天灯街修建了仁爱堂医院，还有教堂、修道院和神父住房。仁爱堂建立之初只设有门诊部，后开设了住院部，20 世纪中期，医院规模扩大，病床由原来的 60 张增加到 100 张。医疗设备更新，手术器具较完善和先进，可以进行各类大中小型手术。

^① 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中华医史杂志 2006，1 月，第 36 卷，第 1 期。

^② 现为重庆卫校第五人民医院分校。

^③ 法国天主教重庆教区总主教。

仁爱堂医院也很重视医院护理人才的培养，该院于 1945 年成立了仁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共培养了 81 名学员，主要在该院从事医疗护理工作。

仁爱堂医院于 1953 年更名为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1975 年，改建为重庆市中医研究所。^①

教会医院的开办，使得西医开始在重庆广泛传播开来，并在重庆治病救人，造福百姓。重庆民众开始接纳和学习西方医学。随着西医在重庆的传播，很多区县也开始接触西方医学。1931 年来重庆宽仁医院工作的贝西尔医生就提到：“近年来，连穷乡僻壤的中国人，都知道了一些外国医药的价值，不论什么职业的外国人，出门的时候，每到一处村庄，总有乡下人绕着，索取碘酒，金鸡纳霜，泻盐之类”。一般民众都知道“外国医院对于看护孕妇与助产工作甚为擅长。”^②基督宗教所办医院由于具备宗教背景，很多医院的医生也帮助宣传现代卫生知识。他们在为病人诊治的同时，向病人宣传如何预防常见疾病，如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一些知名的外国医生也义务参加各种公共卫生演讲。在一些特殊时期，如传染病流行时期，很多医院义务为重庆民众进行医疗注射等。总体来看，基督宗教所建医院不仅缓解了重庆民众的疾苦，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西方医学在重庆的传播和发展，为重庆现代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教会医院除了在传播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外，在传播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国传教士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民众宣传卫生常识，改变其不良的生活习惯，建立卫生意识。他们通过直接宣传的方式帮助重庆民众认识到日常卫生的重要性和一般疾病的预防措施。如举办“妇女卫生讲习班”、开展卫生座谈会、家庭拜访等方式。另外，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提出对信仰基督教的要求，以基督耶稣的名义要求信众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要求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是一种新的禁忌，这种禁忌的方式对于教徒的行为和习惯的改善是有一定作用的。最后，基督宗教在学校中传播医疗卫生知识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基督宗教在重庆地区创办了多所小学，部分学校里，卫生常识是主要课程之一。学生的学习能力强，正是在习惯形成时期，对他

^①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是集临床、教学、科研、制药、信息研究为一体的中医药临床医疗科研单位，是重庆市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卫生部审定的高等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实习基地，是国家中医管理局全国中医急诊培训中心之一。

^② 【美】巴西尔：《美国医生看旧重庆》（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 年，第 197 页。

们的教育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也可以扩大到学生的家人及亲友，对卫生知识的传播很有帮助。另外，一些医疗机构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积极向受助者宣传医疗卫生知识，让他们在看到医治效果的同时接受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卫生机构还制作相关的标语、广告等进行宣传，成效良好。

（二）文化出版事业

“文字事工”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来华差会开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多集中在沿海一带。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重庆地区教会出版印刷机构很少。与出版有关的机构只有重庆华西圣教书会、重庆白果树书院和书局（天主教）。其中华西圣教书会较具规模，对基督总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东川区会书刊部。《益世报》和《崇实报》也是当地较重要的报刊。

1. 重庆华西圣教书会

重庆华西圣教书会于 1899 年初成立于重庆，于 1941 年关闭，存续 40 余年，是基督宗教在华西地区最重要的文字出版机构之一。中国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也认为，圣教书会在基督教文化出版中占有重要位置。至 1912 年，全国一共有九家圣教书会^①，但其他的八家都位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只有重庆的圣教书会是面向西部开展工作的。

华西圣教书会出版物题材丰富，除了为传播福音印制的各种出版物，如福音传播书籍、圣经节选、教义教规、圣洁生活等，还印制一些科学常识类的书籍和小册子，有助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重庆地区的传播（见表一）。

表一 1904 年华西圣教书会出版物分类统计^②

德行	科学常识普及	福音传播书籍	教义教规	圣经节选	诗篇	破除崇拜	个人传记	圣洁生活	其他类别	总计
10	6	22	13	11	4	5	5	1	13	90

华西圣教书会在出版物发行过程中努力采取灵活多样的的方式，如设立发行

^①九家圣教书会分别位于上海、汉口、重庆、北京、沈阳、福州、厦门、广州和香港。

^②资料来源：J. Vale, West China Tract Society's Literature: A Review,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处、由推销员售卖、依靠西三省教会系统发售或部分免费发送、邀请名人开展讲座，制作广告等。这样的方式使得华西圣教书会的发行量在起初的20年内稳定增加（见表二）。

表二：华西圣教书会历年发行量(1899—1919. 6)^①

发行年	发行数量（份）	发行年	发行数量（份）
1899	3, 700	1909	1, 509, 528
1900	16, 700	1910	1, 249, 524
1901	48, 863	1911	876, 448
1902	79, 716	1912	891, 198
1903	131, 136	1913	1, 181, 085
1904	171, 776	1914—1915. 6	2, 144, 758
1905	180, 000	1915. 6—1916. 6	1, 346, 796
1906	240, 000	1916. 6—1917. 6	1, 705, 030
1907	290, 050	1917. 6—1918. 6	1, 699, 446
1908	452, 063	1918. 6—1919. 6	1, 533, 372
前10年发行总量	1, 614, 004	前20年总发行总量	15, 751, 189

重庆华西圣教书会不仅仅在帮助传播基督福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一些出版物中也涉及到了科学常识。人们通过阅读这些科学常识的小册子了解了西方科学，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另外，有一些印刷资料也为破除中国传统陋习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如一些宣传小册子中谈及吸食鸦片、缠足等的危害，并积极劝导民众戒除不良习俗。

2.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东川区会书刊部

安息日会很重视出版工作，全国总会从开始就设有出版发行机构，如文字布道部、时兆报馆和上海时兆月报社。重庆东川区差会相应设有书报部，推销该会所出版发行的刊物。发行处设在市中区保安路（今八一路）教堂。在重庆发行的

^①资料来源：Table of Circulation And Cost of Working ;W. C. R. T. S Twenty - Four Years Record , News, 1906. No. 7. —1907, No. 3.

刊物主要有：《时兆月报》，内容有以安息日会神学观点解经、时事报道与分析、新闻评述、卫生知识以及趣味性的生活小常识，图文并茂，广为流传；《善工内刊》，以图片为主，配以文字说明，主要内容是传播福音，此外介绍保健卫生知识，是不收费的宣传品；《末世牧声》与《安息日课》，是教会内部发行刊物，以解经为主；此外还有《时兆函授教材》等。该书刊部于1951年随东川区差会工作结束而终止。

3. 《益世报》

《益世报》于辛亥革命前由华籍比利时神父雷明远（1927年加入中国籍）在天津创办。初为周刊，后改为时报。1938年12月8日迁至昆明，1940年3月24日迁至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该报由天主教重庆教区接办，为对开四版大报，报馆设于市中区中华路138号，至1948年停刊。《益世报》在重庆复刊词上阐述其办报宗旨：第一，本报自有生命以来，即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奋斗。从“九·一八”起，我们始终主张抗战。第二，对内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第三，本报为公教教友之报纸，有宣传教义之职责，我们遵守教义，对国际局面以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人类幸福为最终目的。第四，公教教义，以人类生活精神重于物质。第五，公教教友在智识方面，宠信真理。第六，本报过去有服务版，在全国报纸中实属创举。《益世报》除了举办“宗教业谈”、“宗教与文化”、转录教会名著外，在宣传抗日爱国、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 《崇实报》

《崇实报》是天主教重庆教区周刊。1904年由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和雷龙山创办，中国教士任总编辑，面向社会发行。刊载内容有：国内外新闻、时事政治评论、宗教知识和教务活动报道、西学、社会见闻录、重庆银元牌示、广告等。辛亥革命后，增加了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分量。该报传播了一定的社会信息和科学文化知识，是当时重庆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发行量较大，全国各省均有人订阅，在重庆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三）教育事业

近代的重庆基督宗教在传教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创办了一批神学院校和普通中、小学。

1. 神学院校

（1）重庆灵修学院

该校为基督教神学院，前身是中国基督教福音派解经学家、著名神学教育家贾玉铭牧师于 1936 年在南京创办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抗战期间迁入四川，几经转折，1941 年迁至重庆黄桷坪文峰段 40 号，在此办学 16 年。1946 年、1948 年和 1956 年分别由韦丹忱、潘子丰、毛仰三继任院长，于 1957 年停办。

重庆灵修学院先借南山中学一部分房屋做院址，然后以法币 12 万元买得马嘉礼夫人（美籍人）在黄桷坪文峰段 40 号房地产 5555 平方米（原数字式 500 丈），1945 年又买文峰段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宿舍及地皮 15 亩，价法币 200 万元（此款部分为外国友人捐赠，部分是下江旅渝的资本家所捐）。1946 年 8 月，又买崇文路地皮 55 平方米（原数字为 5 方丈）。至此学院楼房 7 栋 32 间，地皮约 32 亩，形成解放后的全部院址规模。

该院章程写明：“学校圣工，仰望主，不募捐，不借贷，过信心生活”。强调教书育灵，主张把知识和灵修相结合，将信仰和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该院设有灵修科、神学科、圣经科等，共培育学生 123 人。

（2）重庆神学院

重庆神学院创立于 1944 年 9 月，院长是陈崇桂牧师。建校初在宜宾专置街暂借内地会福音堂为临时校址，1946 年从宜宾迁来重庆市市中区放牛巷 50 号。此地原为美军驻渝办事处，抗战后办事处撤除，由一美国基督徒奉献 2000 美元买下这块近 2 亩的地，作为神学院院址。

重庆神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造就合乎中国教会需要的教牧人员，训练圣经学校的师资，以及基督宗教的文字工作者。招生范围面向全国，以及东南亚、南亚少数民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神学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陈崇贵院长带领师生积极参与各项爱国活动，组织学习《共同纲领》，支持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等。1950 年 9 月 23 日，由中国基督宗教先辈们发起《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950 年 12 月 1 日，神学院决定辞退 8 位外籍教师，并宣布从此以后不再接受外国差会任何津贴，割断与差会的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三自”道路。1958 年大跃进开始，秋季，重庆神学院停办。

（3）华西三育神学院

华西三育神学研究社由安息日会华西联合会主办，是为该会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

1930年德国人艾约翰（东川区会会长）在四川阆中县创办三育中学，校长是阆中基督传道士黎为之。以后由华西联合会主办，更名为华西圣道社，社长为美国人胡德安。1932年2月，该校迁入重庆，暂借东川会在大溪沟的会址上课。同年5月在重庆松堡修建校舍，1933年9月正式开学。1935年更名为华西三育研究社（简称西三社）。

该校1933年只办有儿童生活团（小学1—6年级）和初级神道科（7—9级），1942年开办中级神道科（10—12级）。1942年，香港中华三育研究社迁来重庆，与华西三育研究社合并，更名为三育神学院，1945年又分开，西三社恢复原名。

华西三育研究社的学生来自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多数是教徒或教牧人员子女。除学习圣经以外，还讲授安息日会的基本信条。学生到中级道科后，按情况分为4组学习：传道组、训导组、事务组和升学组。该校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在学习之余，还在西三社内的时兆报馆印刷厂、农场、鞋店、缝纫社工作。

1950年下半年，西三社师生参加爱国运动，要求人民政府接管学校。1951年，该社由西南文教局接管。

2. 普通中学

“洋学堂”随着传教士来华后出现在中国本土，中国传统上以读经和做八股文为主的教育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传教士所引入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系和注重实学的教育方法，为重庆近代教育观念的根本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全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基督宗教在重庆引入西学的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校内一般有基督宗教社团活动，但这些学校客观上为社会公共教育铺平了道路。近代基督宗教传教士在重庆所办非神学普通中学院校主要有求精中学、重庆私立淑德女子中学、重庆私立文德女子中学、重庆私立精益中学、重庆私立广益中学等。

（1）求精中学

1892年美国人鹿依士在重庆临江门创建了求精中学，于次年开始行课^④。该校的名字是由鹿依士所取，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缺少务实精神，希望创办

^④ 该校正式行课时间为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即公元1893年3月4日。

的学校可以精益求精，就以“求精”为学校名称，倡导学习新知。因此，建校初期该校的办学宗旨是：传播基督教，学习新知。

求精中学自创办起，在之后的 60 年内，培养了一万多名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他们为重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强盛和民族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重庆私立淑德女子中学

重庆私立淑德女子中学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山洞，是由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发展起来的。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基督教美以美会布道会的韦女士（美国人）在重庆戴家巷创办了一所孤儿院，院内最初开设有初级小学。1906 年迁至成都，1910 年迁回重庆曾家岩。以后逐步发展，先后增设高小、初中、高中，当时学校只收女生。1937 年呈四川省教育厅批准立案，定名为重庆私立淑德女子中学。解放前该校经费主要由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拨给。1951 年，学校更名为重庆私立蜀德中学，兼招男生。1952 年 11 月，该校由人民政府接办。现为重庆市第十五中学。

（3）重庆私立文德女子中学

1914 年，加拿大基督教英美会女布道会在重庆打铁街创办了文德幼稚园，1918 年改办小学。1924 年教会派加拿大人戴尔德和施尔文任正副校长。1925 年开办初中，只招女生。1928 年，遵照国民政府部门令由中国人包克勋（女）任校长，更名为重庆私立文德女子初级中学。1931 年，该校曾与私立重庆中学（即后来的精益中学）合并，1933 年恢复原校名，重新独立招生。1943 年增办高中，学生近 700 人。该校每年升学率达 60%，不少学生以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才，如 1929 年就读于该校的优秀学生丁雪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位女大使。

1952 年该校由人民政府接管，与精益中学合并，成为重庆市第十一中学。

（4）重庆私立精益中学

1919 年，加拿大英美会在弹子石租房开办“华英中学”，1922 年迁入新校舍。1938 年学校在龙井湾添加校舍，增设高中，更名为“精益中学”。1940 年，学校因办学成绩优异，政府准予完全中学立案。该校建国前学生最多时有 800 余人，毕业升学率达 50%，其中多数升入华西协和大学。1952 年，该校由人民政府接管，与文德女子中学合并，成为重庆第十一中学。

(5) 重庆私立广益中学

重庆私立广益中学位于南岸黄桷埡，前身是广益书院。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国基督教会公谊会在重庆下都邮街（今解放碑附近）创建广益书院，1898年改为广益学堂，继后称广益中学。1900年学制改4年为5年，学生人数增多，公谊会在黄桷埡文峰段文峰塔侧购地120多亩修建新校舍，1904年，学校迁入新校址。

学校环境优雅，校舍充足，教学设备齐全，藏有图书近万册。抗战时期，沦陷区不少学生转入该校就读，其中国民党军政要员子女较多，加之来自香港、澳门、南洋等地的学生，生源广且素质较高，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奖誉为“江巴学校之冠”。每年毕业升学率达80%以上，为社会造就了大批人才。1951年，该校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重庆第五中学校。

3. 普通小学

除上述神学院和普通中学校外，教会还创办了一些小学（见表三）。

表三 1912—1949年重庆教会创办小学

年份	学校	年份	学校
1935年	民生路若瑟堂培英小学	1929年	荣昌县外西街真原小学
1928年	渝中区龙家湾明德小学	1938年	铜梁县巴川镇建设路育小学
1912年	永川书院巷天主堂兆曙小学	1919年	铜梁县尹嘉镇导善小学
1920年	大足县石马乡天主堂德英小学	1932年	重庆南岸慈母山慈德小学
1940年	合川县杨柳街德智小学	1949年	巴县铜罐驿天主堂若瑟小学

这些小学由教会创办扶持，教师由教会人员或教会所找专门人员担任。日常经费支出也大多由教会承担，如永川书院巷天主堂兆曙小学在向重庆天主教会申请日常经费中，就涉及了俸给费、办公费、膳费等开支名目。^①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重庆的基督教会学校对重庆的社会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通过学校，西方人传播了他们的人文社会知识，也向我们介绍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

^① “永川书院巷天主堂兆曙小学经常费预算书申请”，全宗号0234，目录号1，案卷号0257。

开创性工作。但是在重庆学校内基督教的精神和信仰的工作，似乎效果不佳，虽然很多学校内设有福音堂、固定时间进行讲道、组织师生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等，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未真正成为一种信仰和崇拜。

（四）育婴慈幼事业

育婴慈幼是基督宗教所办慈善福利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各种宗教在重庆地区的传播，都重视对育婴慈幼事业的开展。基督宗教之所以选择在重庆开办育婴慈幼事业，一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重男轻女，女婴遭受迫害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包括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等人为灾害，由此而造成婴幼儿无家可归、失学流浪，给他们幼小的身心带来莫大伤害，因此对他们的救助是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重要内容。当然，基督宗教对婴幼儿的救助也有利于教会传教，因为儿童学习能力较强，信仰容易塑造，对他们的照顾很有可能会使其皈依基督教，对基督教在重庆的传播大有益处。

清乾隆、道光年间，教会在巴县办堂设所，收养救助贫苦婴幼。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和政府当局相继举办育婴育幼院所。至 20 世纪 40 年代，官方、民间、教会办育婴育幼场所 26 个，但多因经费不济，舞弊侵蚀，婴幼生活凄苦。教会育婴院婴幼更备受歧视、虐待折磨，沙坪坝育婴院婴儿死亡率高达 73%。抗日战争爆发后，陪都重庆的儿童养育事业迅速发展，社会部、赈务委员会先后设立儿童教养院、育幼院（所）13 个，收养孤苦无依孤儿、贫苦抗属、公教人员子女数千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6 个保育院，收养战区难童占全国 47 所保育院收养难童总人数的 70%；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在合川创办育才学校招收保育院难童入学。

1. 重庆中正福幼村

重庆中正福幼村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区会重庆教区在蒋介石赠给该会的“重庆黄山官邸”办的一所孤儿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 1946 年前往南京，蒋介石将其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赠给重庆卫理公会办救济服务事业，并捐助当时价值 25000 美金的法币作为基金。同时约请在广东办孤儿院的美籍传教士山德斯来渝负责筹划，聘请留美教育学家张君慈（女）来渝做慈幼村主任，卫理公会华西区年议会会督陈文渊任董事

长。同年 10 月开始招收儿童（6—14 岁）。到 1949 年，先后招收 7 批儿童共 142 人。

福幼村原名“中华基督教中正福幼村”，是蒋介石拟“在渝留一永远纪念”之举。按计划拟将福幼村办成完善的慈善机构和生产习艺部门，使招收的儿童能够独立生活，为社会服务。福幼村设有理事会、董事会和中美友谊协会。该村无固定收入，全靠捐款。捐款主要来自各地教会、海外华侨及美国基督教徒。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管黄山官邸，中正福幼村于 1950 年 1 月奉命迁移。一部分迁至江北正街福音堂，更名“习艺所”，有儿童 69 名，直到 1953 年由重庆救济总会接收；一部分迁往璧山丁家坳，有儿童 25 名，大多送入当地华美小学读书，费用由福幼村补助。

2. 白果树育婴院

重庆天主教会 1892 年在若瑟堂附近韦家院坝创办育婴院，收养社会上被遗弃的孤儿。1913 年，育婴院迁往巴县太平乡（今和平桥乡）白果树。教会拨当地田产为该院的经费。1933 年白果树育婴院将 10 岁以上的孤儿送往沙坪坝育婴学校，10 岁以下的仍留在白果树，并收养当地教内外最贫困的女孩。1939 年沙坪坝育婴学校又将部分稍大的女孤儿送到白果树。该院 1951 年 5 月 23 日交人民政府接办，当时有孤儿 49 人。

3. 沙坪坝育婴学校

该校开办于 1933 年，重庆方济各女修会法籍修女宋伯华任院长，比利时籍修女丁明德任管理。开办之初是收养从巴县白果树育婴院送去的 10 岁以上的孤女和仁爱堂收养的孤女。以后又收养重庆附近被遗弃街巷路边的女婴。1939 年起，沙坪坝育婴学校将稍大一点的孤女送白果树育婴院，只收留较小的弃婴。自开办到 1950 年时，共收养弃婴 483 人，成长出院 128 人。

4. 大足难童教养院育婴院

1920 年，法籍传教士季伯吉任大足马跑场（今石马）天主堂本堂神父时，创办孤儿院，自任院长。1938 年法籍白安德任本堂神父兼院长时，将孤儿院扩大，更名为“难童教养院”，主要收容抗日期间沦陷区流亡重庆和重庆遭日机轰炸而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的难童及当地贫苦儿童。人数最多时达 150 人。经费主要靠教会供给，其次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资助，以及组织难童做肥皂、袜子、

打草鞋、种菜等生产自救。难童教养院中品学兼优者保送深造学习，剩下的小学毕业后，年满 16 岁者，教会安排就业。1950 年，因经费无源停办，难童解散。

重庆解放后，1950 年 3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接收接管旧内政部第一、第二、第六育幼院和救济院育幼所，在歌乐山合并成立市保育院。1951 年 6 月迁至沙坪坝育婴学校，改名为市孤儿教养院。同年 11 月，福幼村并入，1957 年江北儿童教养院、北泉慈幼院并入，旧育婴育幼院所接收、调整至此结束。其间，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对旧育婴育幼院所以慈善为幌子，披着宗教外衣虐杀、奴化婴幼儿，私藏枪支、土炮等大量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和依法惩处；配合治理社会秩序，对流浪儿童收容教养。1954 年 7 月，孤儿教养院更名儿童教养院。1958 年迁往磁建村，“文化大革命”初期迁九龙坡区走马梁，1971 年改为市第三教养院。1974 年，以儿童收容将越来越少和精简机构为由，第三教养院与第一教养院合并成立市社会福利院，改称儿童福利所。1984 年 7 月，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恢复儿童院独立建制，定名为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五）养老福利事业

除上述在医疗、教育、文字出版、育婴慈幼的慈善事业外，基督宗教在重庆还开办了如天主教女孤老院等养老福利机构。1918 年，重庆商界名流杨咸斋、蒋元兴、古虚之、温少鹤、李柱成等同天主教商议，在教会韦家院坝“安纳堂女孤老院”基础上，合办一所“中西女孤老院”，商会筹资 3 万两白银，教会出房子和管理人员。开办初期只有 20 名孤老，后来逐渐增多，最多时达 120 多人。当时将所筹集的白银存在蒋兴元恒泰钱庄生息，每年支取日常费用。1925 年恒泰钱庄倒闭，折还本金 1 万 5 千两白银，存入李柱成的永升钱庄。1939 年 5 月，为避日军轰炸，孤老院迁到巴县永兴场，1942 年再迁巴县含谷乡段家湾公信堂，教会拨当地田产 60 老石做日常费用，此时有孤老 40 余人，更名为“天主教女孤老院”。后因法币贬值，1 万 5 千两白银化为乌有，从此孤老院的一切日常费用全部由重庆教会负担。1950 年教会由人民政府接办，当时有孤老 39 人，转入九龙坡区苦竹坝福利院。

四、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发展分析

（一）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在近代重庆发展的动因分析

1. 基督宗教在渝传教的障碍

禁教政策起始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康熙晚年之际，罗马教皇禁止中国教徒敬孔祭祖，激怒了康熙。康熙帝一改过去对天主教的宽松政策，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1732年，雍正继位后即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命令。之后，禁教政策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给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以沉重打击。加上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位于中国中西部的重庆更是缺少中西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19世纪初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传教事业举步维艰。有的传教士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人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把这些人当做神明崇拜，认定上帝远远比不上孔子和其他中国哲人，基督教的宗旨不论从深度和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圣人和智者的说教相比。中国人沉浸于唯物主义，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东西，都是难上加难的。因为至圣先师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欲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②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下，传教士以慈善为砖敲开禁教的壁垒是迫不得已却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控制和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中西之间的交流阻断，中国人对西方知之甚少，要他们突然接受一种完全陌生的宗教文化是不太容易的。因此，想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宗教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基督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很多地区都引发过教案，表现了各地民众对西方宗教的排斥。重庆地区曾发生过几次较严重的教案，主要集中在大足县和重庆。

中法战争后，法国传教会在四川各地广修教堂和会口，其时，大足县龙水镇群众出于对侵略势力的愤慨，曾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和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六月十九日两次灵官会期，打毁龙水镇教堂。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8月8日，余栋臣、余翠坪率领煤窑纸厂工人和挑贩百余

^① 唐逸：《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②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120页。

人攻入龙水镇，杀死教徒 12 人，毁房 200 余家，同时发布“檄文”，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4 月，巴县知县诱捕余栋臣，余栋臣宣布起义，仅 10 来天聚众 6000 多人。有人提议“反帝必先反传教士”，于是同年 7 月 3 日，他们捉拿了法籍传教士华方济作为人质，余栋臣等分别攻打永川、江津、重庆、铜梁、内江、安岳等地，在铜梁又捕华籍神父黄用中为人质，各县纷纷响应，“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震惊全国。后清政府清剿，起义失败。

第一次重庆教案发生在清咸丰八年（1858 年），法国传教士要求归还自雍正王朝起禁教期间没收的川东四所教堂旧址，准许其在长安寺地改修重庆教堂，教师范若瑟手持清朝文牒，拆除长安寺，修建真原堂，川东三十六属团体保甲办公暨省首事聚会之处，均从长安寺迁出。不久，范若瑟又扩建真原堂，侵占民房，重庆民众遂于同治二年（1863 年）正月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第二次重庆教案发生在光绪十二年（1886 年）5 月 30 日，其起因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鹅项颈修造教堂，英国基督教在丛树牌建造房屋，占据险要，人心惶恐，重庆绅商市民 20 余人，联名上书，请求制止未果，激起民愤。5 月 30 日，群众捣毁鹅项颈、丛树牌教堂，城内法国教堂及从教殷实者亦被拆除。惟教友罗元义雇有打手防范，伤民众 20 余人，死 3 人，于是群起寻仇，聚众 3000，一举捣毁了城内外教堂、医馆、铺屋。另外，巴县、江北、大足、铜梁等地的教堂、修道院、医馆及教会的铺屋 300 余家均被抢毁。此次教案发生后，经官方出面，处决了打教首领石汇和教友罗元义，赔偿教会白银 40 余万两，教会还取得了向下川东西阳、秀山等地传教的权利。^①

几次教案的结果都是以赔礼道歉、割地赔款、甚至杀民谢罪的方式结束，严重损害了重庆人民的感情，导致了重庆人民对外来宗教的抗拒。因此，教会必须寻求一种可以被重庆民众所接受的方式重塑基督宗教的形象，慈善义举便成为一种最佳手段。

2. 近代重庆天灾人祸横行

近代重庆地区灾荒频繁而严重，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特殊的战争环境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战乱频繁，兵差兵役负担繁重，大量的青壮劳动力被征兵、

^① 重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拉夫，军事摊派有增无减，大大削弱了各地在人力物力上对农业的投入，使得国家、地方和个人的防灾、救灾能力大为减弱。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重庆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逐步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洪流中。从此以后，重庆就不断上演着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在一次次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和农民运动的激流中动荡不定。即使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也并未安定下来，广大人民在战火中四处逃生、无家可归，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更重要者，由于战乱的破坏，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使原本就很薄弱的救灾防灾系统更加脆弱，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人间炼狱中再一次遭受劫难。无休无止的空袭轰炸，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灵创伤。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而当时的重庆人民更是饱受战争之苦。抗战胜利后，又被内战的阴影所笼罩。在兵灾险祸中求生存的重庆人民饱经沧桑，生活极为不易。

近代重庆社会多灾多难，而且社会弊病丛生。这种持续不止的兵灾和自然灾害使重庆社会自救的能力日益弱化，政府财力匮乏，赈济活动弊端丛生，在社会中的信任度极低。外国传教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在重庆开展慈善福利事业的。他们每逢重大灾害，往往会竭其所能予以救护赈济。“救灾恤贫一类的慈善事业在基督教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外国因基督教的进步，所有慈善事业多由政府和非宗教的团体办理。但在中国，基督教会因环境的需要，不能不兼办这一类的事工，而尤注重开设医院，扶助紧急的需要者以及遇灾变时进行有组织的救济工作。”^①

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对宗教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评述，他说：“人当得意之时，不知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②因此，当时很多重庆基督信徒对基督教的所谓“皈依”，并不是对基督教义教理的理解，而是一种世俗的“功利”驱使，是“以满足个人需求为目的”。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

^① 贝克：《救灾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33年，第12期。

^②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6），科学出版社，1959年。

任何一个宗教能为这些挣扎在痛苦边缘的人们施以恩惠，都会缓解他们的仇视、获得好感。基督宗教也不例外。外国传教士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以慈善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

（二）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与传统慈善福利事业的特点比较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最初是用“慈”来代表“爱”。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以及墨子的“兼爱”思想等。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要求用爱心去待人，尊重他人，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修养，其实质都是要求取消人们之间的差别，达到人我的融合统一，借以协调好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助。对比近代重庆传统慈善福利事业与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二者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 无论是近代重庆传统慈善福利事业还是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都是“仁爱”的一种表现。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原则，“仁”就是人性的实现，所谓至善，即是“仁”。一个人只有做到爱天下所有的人，才能做到“明明德”。“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因此中国传统治国思想都注重以慈爱治天下，传统慈善福利事业就是实现这一超越的重要手段。而作为上帝之爱的化身的基督，本就是为人类生存和获得拯救而存在的，只有在对于上帝慈悲的信仰中，人才具有被解救的希望。基督宗教的学说与实践、信念与仪式，都是基于对爱的理解，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张扬爱，实现爱”。因此基督宗教所做的慈善福利事业成为基督的爱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教徒遵从上帝命令解救人类的一种途径。

2. 无论是近代重庆传统慈善福利事业还是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都是少数人的事业。对于传统慈善福利事业，无论是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还是民间慈善活动，一般都由地方上有影响的士绅或官员主办，经费来源主要是少数富人的捐献，平民百姓很少参与，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在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剥削下，普遍比较贫困。也就是说，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两方面来看，士绅等所

谓的社会精英享有独占社会慈善的特权，平民的参与只能是陪衬。对于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而言，除了由教会出资创办的机构，其它一些由传道士或牧师所办的慈善事业，所需资金仍是由当时的少数富人提供，社会捐款很少，如重庆中正福幼村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区会重庆教区在蒋介石赠给该会的“重庆黄山官邸”办的一所孤儿院；基督宗教在重庆开办的天主教女孤老院等养老福利机构是1918年重庆商界名流同天主教商议，在教会韦家院坝“安纳堂女孤老院”基础上，合办的一所“中西女孤老院”，资金主要由商会筹资，教会出房子和管理人员；1944年创办的重庆神学院也是由一名美国基督徒奉献2000美金买下一块地作为神学院的院址。

3. 从某种角度来说，无论是近代重庆传统慈善福利事业还是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慈善只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传统慈善福利事业除了救济功能外，还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清末民初社会秩序混乱、人心道德败坏、民不聊生，统治阶级通过慈善之举，匡世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基督宗教来到重庆是为了传播福音，为了能广泛传播福音和吸引更多的人入教，基督宗教将宣教范围和服务对象扩大到所有社会阶层：设医院、办学校、发展出版印刷业，让基督福音深入人心，一切对于社会公益的事，莫不尽量实行，所以说慈善之举也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比如，医学常被称为“福音的婢女”，是传教的辅助手段，是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途径。前面所提到的私立宽仁医院、私立仁济医院、仁爱堂医院等三家医院都是外国教会为开创传教事业所创设的，因此这些医院都带有较浓的宗教色彩，医院都有专职的牧师讲道，组织礼拜等。如解放前私立宽仁医院在每天上午9点门诊病人多时唱诗，讲耶稣福音；还在病房与个人讲道，为病人祷告。而私立仁济医院设有宗教部，有牧师负责安慰病人，对病人传讲福音，劝人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世主。每周一清晨举行职员崇拜会，由牧师主领，读圣经，唱诗，祈祷。即使是召开学术会议或者是医院的常务会，第一项都是神父主持布道。在很多教会开办的中小学校内也都设有福音堂、礼拜日进行讲道、组织师生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月会”等。正如刘继同先生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概览》中所说：基督教“由扩展与传播福音为主转变为基督宗教的生存需要与发展战略，由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动机为主转变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相互交织，由以基督

教会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为主转变为回应和满足变迁的中国社会需要，由直接动机为主转变为以间接动机为主，由逃避宗教迫害和文化交流为主转变为宗教侵略和精神文化征服，由工具性动机为主转变为工具性动机与目的性动机相互交织。”

①

但从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来看，其与传统的慈善福利事业无论是从思想渊源还是行为方式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1. 基督宗教所开办的慈善福利事业深入到重庆各个地区，可以为政府社会救济事业填缺补漏，为稳定当时重庆社会起到重要作用。近代重庆官办、私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多在主要城区和城镇，边远农村地区较少。如，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始所建立的善堂善会就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内，1859年创办的至善堂在城内瓷器街；1879年创办的明心堂、1919年创办的达善堂、1923年创办的达德堂堂设均在江北；1898年创办的南尊德堂、1931年成立的同庆善堂堂设在南岸等。对边远农村的养老、育婴、义诊、施药、教育等义举可谓少之又少。而基督宗教不仅在主要城镇布道施善，而且还在重庆各边远乡村设立诊所、小学等，如在永川、铜梁、璧山、合川等地设立小学，救助无家可归的难童及当地贫困儿童。传教士通过到乡下的行医活动，为偏僻穷困山村的村民带去了医疗救助，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慈善救济事业的不足，使更多的人获得救助。

2. 基督宗教开办慈善福利事业不仅仅是一种施舍，更注重的是对受助者生活能力的培养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推及于社会生活，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惠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每有巨灾发生，统治者都谨奉“民为邦本”的古训，通过施粥、赈谷、调粟等多种慈善救济措施来赈恤众多灾民和流民，以期达到“博施于民可百能济众”的境界。近代的一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力行仁政，敬德保民，兴办或扶持各类慈善机构。中国的这种传统慈善思想，是一种怜悯、博爱的思想，只是对贫困者施舍财物、为流浪者提供食宿、为无力下葬者施以棺木等，却忽视了对受助者生活能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能救一时，不能救一世，甚至让受助者对救济产生依赖，减弱其通过自我努力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① 刘继同：《近代中国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概览》，中国公益慈善网，基督教慈善。

而基督宗教创办的慈善福利事业,改变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只“养”不“教”的模式,在很多基督宗教创办的慈善福利机构中,注重对受助者能力的培养,使其具有一技之长,即使离开慈善福利机构也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如大足难童教养院育婴院就会组织难童做肥皂、袜子、打草鞋、种菜等生产自救;华西三育研究社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在学习之余,还在西三社内的时兆报馆印刷厂、农场、鞋店、缝纫社工作。这种“教养结合”方式对后来中国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 and 转变有着一定的影响。

3. 传统慈善福利事业只是对受助者物质上的帮助,而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除了为受助者提供物质援助外还极重视他们的精神生活。传统慈善福利事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仁政”,它强调对诸如鳏寡孤独、贫疾幼弱等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收养”。传统的慈善福利事业是一种物质上施舍,施予无粮者以米、施予病患者以药、施予无家可归者以屋棚、施予亡者以棺木等。很少对因贫穷、疾患等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予以救助。基督宗教慈善福利机构中,都很重视对受助者的心理关怀。基督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爱人”的宗教。圣经中讲述每个人爱别人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包括爱自己的邻居,并且宣传平等观念,认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传教士会向重庆民众传播福音,鼓励他们树立一种信仰,不仅派有专门的传道士进行布道,让机构内的受助者经常过宗教生活,而且还经常聘请教会著名人士到院内开展布道大会,所开设的学校课程中,圣经也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虽然此种举措的初衷是传教士在重庆地区传播基督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皈依基督宗教,但教会能在受助者流离失所、对生活失去希望之时给予他们一种信仰,使他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对抚慰受助者的心灵和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重庆近代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社会功能

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看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均衡机制,社会依照共同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社会成员起着内聚粘合的作用。各种制度从整体上构成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依存,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波及到其它部分,从而影响整个系统。而各种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功能。没有功能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正是功能主义的公理。根据这种理论,宗教被看成是一种社会机构,即一种体制化了的人类行为的形式。

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时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内容、形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变化是由不同时期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发挥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帕森斯把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战略概括为两点:(1)识别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要进行功能分析,即揭示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包含何种功能。二是应具备何种功能才能保证系统的协调运转。(2)分析满足这些功能要求的特殊社会结构。即哪些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社会结构应该怎样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和发挥社会系统的基本功能。^①

基督宗教自传入重庆后,大批传教士来渝,深入各地,备尝艰辛,除了传教外,为重庆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基督宗教开办的慈善福利事业中,育婴堂、孤儿院等属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已有的内容,而为废除缠足、烟害、婢女、童养媳等问题所发起的天足运动、戒烟运动、废婢运动等,则突破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范围,带有近代意义上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因而这些慈善机构也就逐渐的演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公益机构。这体现了中国慈善福利事业的外延扩张。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慈善之举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慈善福利机构,是为满足当时的特定社会需求而出现的,这些慈善福利机构联系起来实现了社会系统的基本功能。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为了保证其自身的维持、存在,需满足4种基本功能条件:第一,适应。即保证环境可以为系统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并可以再系统内部进行分配。第二,目标达成。制定相适应的各种目标,确定各种目标的重要顺序,并调动成员积极性及寻找相应的资源保证目标的实现。第三,整合。系统是由各部分组成的,要发挥系统的功能就必须使各部分协调发展,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第四,潜在模式维系。一种系统功能正常发挥后,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维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制度化。^②

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机构为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及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在努力完成这四种功能条件。依据结构功能理论分析: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动因在于教会内部的紧张,这种紧张体现在当时基督宗教福音传播的

^①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P164).

^②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P167).

困境，而内部的紧张又与外部的环境压力有关，即重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基督宗教一系列的慈善福利举措是由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关系造成的。基督宗教在重庆成立的各种慈善福利机构都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员不仅有实然性的认知，而且有理想性的要求，基督宗教希望通过这些慈善福利事业推进他们在重庆传播福音，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当然理想要求与现存状态一定存在某种不一致，这体现在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局限性，在众多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们能够帮助的只是少数，并且福音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的皈依并不是信仰上的，只是暂时的。

对于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首先发挥作用的功能是适应功能，基督宗教慈善福利机构只有适应了重庆现实环境中的压力，并动员教会内部力量从本土环境中获取维持教会所办慈善福利事业的资源，才能保证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维存。此时，系统实质上处于经济活动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而要动员系统内部力量或成员，必须确立成员公认的总目标，否则教会慈善福利机构的适应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于是进入目标达成的功能阶段，实现教会传播福音、助人的总目标，需要成员的共同参与，他们必须获得最低程度的一致。而此时，情感在维持系统一致性时并未发挥主要作用；在目标达成阶段以后，当教会慈善福利举措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后，他们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压力状态开始缓解，不仅实现了传播福音、助人的总目标，而且内部各成员的利益需要和角色期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共同实现目标的努力中，成员间也获得了沟通和建立情感关系的条件，达到整合状态，形成了在宗教情感、理想信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共同取向，各慈善福利机构进入整合功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当上述三个阶段依次达成后，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进入了潜在模式维持阶段，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把适应、目标达成和社会整合三种功能所实现的结果形成一种秩序保存下去，延续下去，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现实。

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繁荣发展充分体现了这四种功能协调、有序的发挥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变化，很多社会结构解体，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需要形成一种新的适应、新的目标、新的整合以及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维持。之所以有些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可以跟随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长时间

的存在（虽然大多改变了存在方式，不再依附于基督教会，而是独立或由政府收管），而有些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消亡，就是因为缺少基督宗教慈善福利机构要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的功能。

近代以来，很多人将基督宗教定义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凸显其消极的一面。认为传教士就是为帝国主义侵华而服务的。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那些年，基督宗教的传教士在华获得了很多特权。我们不可否认，其中确实有部分的传教士利用在华的这些特权作威作福，欺辱百姓。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基督教传入重庆的这一百多年中，基督宗教传教士利用医疗救助、育婴慈幼、救灾救济等手段帮助其在华传播福音，这些教会慈善福利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在民国以后，淡化了其宗教色彩，逐步融合到重庆民众的生活当中，客观上也为重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重庆民众的生活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发挥了其特定的社会功能。重庆近代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体现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风气

西方传教士中不乏有殖民主义观点的人士，但是因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教士的身份和信念，以及基督宗教博爱、宽容的理念，使得很多传教士在传教时关注着民生民情，举办社会赈济、倡导禁烟、禁毒，倡导妇女解放等。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传播福音而开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其宗教功效并不明显，相反的，世俗功效得到了充分体现。基督宗教在重庆积极兴办学校、医院、出版印刷机构、创办育婴、养老机构、传播西方文化、反对陋习、提倡禁毒、禁赌等，这些对重庆社会革新是很有好处的。如缠足是一种社会陋习，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极大伤害，为此，来华医学传教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895年，立德夫人在中国发起了放足运动，重庆各教会医院积极响应。护士学校学生的“天足”（从无缠足者）形象，代表着新女性的健康、自尊、自立和自强，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①

晚清以后，重庆地区吸食鸦片者有增无减，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健康，有的吸食者耗尽所有家财，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矛盾。一些传教士从人道主义出发，纷纷宣传禁烟，发起禁烟运动。他们在重庆地方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吸

① 刘天路：《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食鸦片危害，驳斥与鸦片利益集团有着各种关联的人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的言论。其中不乏一些中国基督教徒，他们以本地人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戒烟宣传。除此之外，传教士们还积极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比如成立戒毒所、在各教会医院、诊所中副设戒烟室或特设门诊，接受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同时治疗由吸食鸦片引起的各类疾病。各教会医院还专门设计戒烟药方以帮助吸食者戒烟，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例如重庆私立仁济医院，拟定规则十条，免费为有志戒烟者提供医药服务；重庆基督教派联合成立一个“戒烟公所”，预备了十几间病房，召人前往戒烟。如果不愿住院的，也可以领药回家服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所就协助了两百多人戒除烟瘾。对全重庆数量巨大的鸦片吸食者而言，基督宗教所提供的这些戒烟服务虽然效果有限，但的确也使不少人获得精神与身体两方面的“重生”。如一位从“戒烟公所”出来的人写下了他的感想：“予也沉沦于三年，彼也拯救于一日，精神百倍，视前次之昏昧，不啻重生。”^①基督教人士反对吸食鸦片的基础是基督宗教道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不仅关注鸦片对人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更关注到了其对道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2. 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重庆的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各地官员更是贪污自肥，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百姓苦不堪言。走投无路的民众寻求一种“偶像”，能够解救他们的神灵，此时，基督宗教传教士们在耶稣的指示下来搭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大众。他们一边发放钱粮给百姓，一边游街布道，很多中国民众就是这样皈依的基督教。所以说，每次放赈后都会出现一个加入教会的洪流。当然，这是灾难成为了传教士的工具，也可以说赈灾事业给他们的宣教事业带来相当丰厚的收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救济正是上帝拯救世人的一个方面。虽然对于基数庞大的重庆人口，基督宗教所能做的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样的慈善行为使西方人在重庆的传教事业发生了转机，偏见在慢慢淡化、消失。

另外，基督宗教的各种教义教规也为重庆社会变革时期基督教徒树立了基本的道德规范，使得基督徒可以在社会衰退动荡时期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人若能够皈依一种宗教，都可以遵守这一宗教的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基督宗教通过宣讲教义教规，培养民众的道

^① “基督教戒烟宣传参与资料”，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234，目录号 1，案卷号 0317。

德规范和情操。一定数量的民众皈依基督宗教，对规范他们的行为和培养他们的道德也是有帮助的。

可见，基督教会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对民众的实物救济，更多在于他们给民众带来的心理的归属。很多基督徒和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的民众在困难、痛苦时期，都接受过基督宗教的帮助。基督宗教为这些人缓释内心的痛苦和不安。这也加深了基督徒和这些民众对基督信仰的接纳程度。

3.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清末民初，重庆基督宗教教民涵盖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作为上帝的皈依者，他们与西洋人结缘。另一方面，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得以日深月广地传入中土，也往往得力于相当一部分信奉基督教的民众。

西方传教士来渝之初，传教困难重重。于是他们开始从事育婴养老、义诊施药、救济灾民等慈善活动，目的在于借此等慈善之举改变民众对他们的看法，解除人们对他们的排斥心理，以达到传教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的确收到了很大成效。对于教会慈善活动，大多数地区都是从义诊施药、开办医院开始的，重庆也不例外。因为在当时的年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容易吸引他们的莫过于传教士的免费施药治病的手段，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成为他们感受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基督宗教的医疗卫生事业，输入了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的医院制度、医学教育、护理教育等，同时也造就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此外，基督宗教在重庆开办的学校，为那些贫苦和落难的孩子提供了接触西方宗教学和西方科学知识的机会，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宣传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改良科举制度，扩大考试范围，将近代各类科学知识作为取士的标准，从而培养更适合近代化事业的人才。^①除此之外，教会所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和发行的期刊小册子，也是宣传西方文化的重要渠道。如重庆华西圣教书局就印刷一些科学常识类的小册子，从客观上引入了新的西方知识，给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带来了新的刺激，对普及科学常识，打破中国旧有世界观、宇宙论起到积极的作用。华西圣教书会出版物中就有化学、天文、电气、地理、社会等方面的相关内容。《益世报》和《崇实报》中也有宗教知识、教务活动报道以及西学等得介绍。基督宗教在重庆的传播体现了中西文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化由激烈碰撞到逐步融合的过程，也体现了重庆人民对西方文化不断认同接纳的过程。

4. 宣传抗战，团结民众，医治战争创伤

(1) 抗日爱国宣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基督宗教传教士及重庆本地教徒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积极宣传，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国之情。如《益世报》在重庆复刊词上阐述其办报宗旨：第一，本报自有生命以来，即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奋斗。从“九一八”起，我们始终主张抗战。第二，对内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第三，本报为公教教友之报纸，有宣传教义之职责，我们遵守教义，对国际局面以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人类幸福为最终目的。第四，公教教义，以人类生活精神重于物质。第五，公教教友在智识方面，宠信真理。第六，本报过去有服务版，在全国报纸中实属创举。抗战期间，私立仁济医院被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作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为抗战救护工作做出了贡献。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师生组织救护队，到市区抢救伤员；并积极宣传救亡和解放运动，曾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日出》、《雷雨》等。

(2) 抗战期间对学生的救助

抗战期间，重庆的教育事业在日寇的践踏下已难以为继，凡是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学校屋舍等均变为废墟。据统计，1938年年底，重庆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在战争爆发后只剩下原来的40%；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失学的学生无处可去，吃住和旅费等都成了严重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救助。一些基督宗教社会服务团体参与救助行动，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开始转向学生救济。他们专门成立学生公社和学生服务处，重庆不少青年学子在青年会的资助下到了后方继续求学。

五、结 语

近代重庆天灾人祸频繁、社会混乱不堪，基督宗教传教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重庆地区的教会慈善福利事业。不可否认，部分基督宗教传教士进入重庆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的，但因为基督宗教是一种传教性的宗教，因此大多数传教士的动机是传播基督福音。基督宗教组织是一个宣扬富有爱心，讲求奉献的宗教组织。基督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爱人”的宗教。圣经中讲述每个人爱别人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包括爱自己的邻居，并且宣传平等观念，认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重庆广大基督教徒在基督宗教各级教会组织的带领下，发扬基督宗教伦理道德的博爱、奉献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近代重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张伯怀所说：“我们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愿宣传宗教传布基督，……但是我们不是宗教的侵略……，在地方人民不欢迎的区域，我们可以不传教，我们的口号是‘为服务而传教’，不是‘为传教而服务’”。^①因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在重庆的发展，不应只看到基督宗教所办慈善福利事业的不足，还应该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近代重庆的传统慈善福利事业。从客观结果来看，基督宗教在重庆所从事的教育文化、出版印刷、医疗卫生、救济赈灾等慈善之举，在重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特殊的影响力。综观基督宗教在重庆的发展轨迹及所从事的慈善福利事业，我们可以发现，基督宗教传入初期，教会受到民众的排斥，传教活动举步维艰，很多民众不满于传教士的特权。但随着基督宗教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其自身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他们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对重庆的社会发展及民众的生活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首先，虽然基督宗教的初衷是要用医疗卫生工作来作传教的铺路石，但客观上来讲，经过外国传教士及本地传教士多年的共同努力，现代医疗卫生开始得以在重庆地区传播，并形成一定规模。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重庆地区人民遭受疾病威胁的严重问题，而且传播了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开始改变重庆地区落后的生活习惯，在推动重庆社会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次，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在近代重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促

^①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展望，边疆服务，第1卷，第4期。

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激烈碰撞到逐渐融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在近代重庆，基督宗教所办慈善福利事业为重庆传统慈善福利事业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不但让重庆了解了西方，也让西方了解了重庆。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努力思考政治、经济、教育的革新，学习西方先进的医疗、生产技术等，有益于人们的生活和相关领域（如教育、医疗等）的近代化进程。

再次，对重庆近代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基督宗教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初是为传教服务的，是传教士为在重庆地区传播基督教福音创设的一种工具。很多基督教会学校开设宗教课程，并举办各种宗教活动。但从客观结果来看，也正是这些教会学校，为重庆地区教育近代化提供了借鉴。第一，基督宗教在渝创办的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学校的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使用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并将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引入到重庆，为重庆地区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借鉴；第二，基督宗教教会学校除了开设宗教课程，还开设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因此，很多基督教徒不仅仅学习到了基督宗教的相关知识，如教规、教义，同时也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不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上，基督宗教教会学校都要优于当时重庆地区的普通学校，对于重庆地区各类人才的培养有很大的贡献。第三，基督宗教教会开办的一些女子学校，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禁锢，使女子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科学知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也使得部分女子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最后，“育人”也是基督宗教在重庆传播的积极成果。基督宗教秉承博爱、宽容的理念，这一理念造就了众多本地传教士和信徒的热血奉献。在重庆基督宗教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西方传教士的努力，更多的是重庆本地教徒的无私奉献。毋庸置疑，近代西方传教士始终在教会中占有领导地位，但是，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顺利开展绝离不开当地基督宗教教徒的努力和配合，他们东奔西走，筹募款项，深入灾区，安抚灾民，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基督宗教博爱的精神。

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福利和教会福利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途径。针对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资源匮乏，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管理模式不断发生变化，政府不再是社会保障的直接提供者，而成为政策的制定者和规范者。新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再是政府包揽。为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我们需要利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社会认可度也较高。基督宗教等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是我国福利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基督宗教本着“爱人”的基本原则在重庆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善于挖掘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巨大潜力，发挥其优势。在现代社会中，基督宗教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关怀弱者，爱人助人的本质。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教会慈善福利事业，使之能够更好地帮助政府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应该鼓励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赋予他们更多社会福利责任，有效利用慈善福利事业的优势，使他们能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的潜能。

2012年2月16日，为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联合发文《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国宗发〔2012〕6号），提出要“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国各宗教共同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国家号召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而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

六、参考文献:

(一) 专著:

- 【1】【美】巴西尔.《美国医生看旧重庆》(中译本)[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 【2】陈天正.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 【3】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6),科学出版社,1959年。
- 【4】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二卷)[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十三卷)[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重庆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卫生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840—1985.
- 【7】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9】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0】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11】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12】刘天路.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3】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14】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15】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 【16】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17】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8】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 【19】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0】周勇.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二) 论文:

- 【1】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2.
- 【2】J. Vale, West China Tract Society' s Literature: A Review,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06.
- 【3】陈廷湘.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J].宗教学研究,

2001, (4).

【4】陈媛.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J].中华医史杂志 2006, 1 月, 第 36 卷, 第 1 期.

【5】邓云、刘婷婷.论抗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救助[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10月, 第31卷, 第10期.

【6】郝红暖.清代民国河北地区慈善组织的历史演变与空间运作(1644-1937)[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0.

【7】胡志方.当代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2.

【8】何璧、谢秀芝.基督教福利组织在社会福利建设中的作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4 月, 第 30 卷, 第 2 期.

【9】黄永昌.政治风潮:长江教案与湖北育婴运动[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报, 2007, (4).

【10】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6, (4).

【11】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 2001.

【12】李传斌、王国平.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J].苏州大学学报, 2002, (2).

【13】刘继同.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概览[Z].中国公益慈善网, 基督教慈善.

【14】刘秀君.清后期至民国前期九江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

【15】龙 伟、陈建明.华西圣教书会的文字事工及其影响(1899 —1919) [J].宗教学研究, 2006 年(4).

【16】齐凡.基督教组织的社会角色解读——以重庆北碚区渔堂湾基督教礼拜堂为例[J].时代经贸, 2007(5).

【17】石莹.近代中国教会慈善事业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

【18】宋玲.近代中国教会特殊学校述评[J].哈尔滨学院学报(教育), 2003, (12).

【19】谭绿英.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以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为例(1928—1940) [J].宗教学研究, 2003, (1).

【20】王佑军.对清后期在华基督教医疗事业的几点思考——兼论其与中国本土医疗事业的比较[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5).

【21】向长水.教会对战地的慈善救济——以民国时期的湖南地区为例[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6, (2).

【22】向长水、刘四平. 论近代在湘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3】谢铭. 论近代广西基督教的医疗事业[J]. 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24】杨欣. 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D].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25】张晓华. 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J]. 史学理论研究，1999（4）.

致 谢

三年前我有幸来到云南大学跟随马居里老师学习宗教学。时光荏苒，三年研究生历程即将结束。回顾三年的学习生活，我深感受益匪浅。我不仅顺利完成了研究生课程，撰写了一定量的论文，还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居里老师那高尚的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我。另外，老师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令我为之感动。眼下毕业在即，念及师恩，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谨向敬爱的恩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何明、马翀炜、高志英、傅云仙、桂蓉、和晓蓉、何林、赵海娟、张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萧霁虹等各位老师，在他们的悉心指点和帮助下，三年来我的学习得到了进步，各个方面都有了提高。同时，我还得到了苏娅、史兰兰、贾洁、史婷婷等同学的帮助，在与他们的思想交流中，我受益匪浅。我还要感谢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我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给了我太多无私的关爱和帮助。毕业论文的完成同样也凝结着她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要向我的母亲表达谢意。

周晓光

2012年4月11日